

□ 王志强

国企改革——外部环境 与 代理成本

一、绪论

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在计划、财税、金融、投融资、社会保障等等领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经济体制改革在解决原有体制的问题的过程中,越来越显化的问题和矛盾的焦点指向了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对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具有重大意义的委托代理关系和代理成本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并引起了设计企业治理结构的问题。企业治理结构是由企业组织结构和权力分配状况以及市场设施所决定的一整套制度性安排。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治理结构的设计可以比较妥当地解决代理成本最小化问题,并且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外部环境的改善对于减少代理成本作用不大;(曹正汉,1997)即使承认外部环境对减少代理成本所起的作用,但也认为这种作用是间接的,即外部环境对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直接产生作用,通过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来减少代理成本。但是这样就不能解释在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尚不发育的条件下,为什么中国的国有企业要比俄罗斯和东欧的情况好得多。本文的观点认为,在中国的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下,外部环境不但对减少代理成本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减少代理成本起直接作用。在企业治理结构中,提高企业效率的途径就是减少代理成本,而代理成本是企业经营者作为所有者与经营者不是所有者情况下的经营业绩之差。由于经营者的行为直接决定了代理成本的大小,影响代理成本的因素及代理成本的最小化只能从经营者行为中去寻找。本文拟根据国有企业的现状,设计一个简略的经营者行为模型,并从中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二、经营者行为特征假定

(一)根据“效用最大化”的基本假定,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作为企业资产的代理人,接受政府或其代理机构的委托,在给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治理结构下,根据自己的能力,寻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经营者付出两种努力行为以实现效用最大化,其中正努力行为是能够增加企业收益的长期行为,如进行投资决策、研究开发计划、组织培训员工等,正努力行为有助于企业发展和效率提高;负努力行为是侵蚀企业利益的短期行为,如进行风险过高的投资,掠夺性资产转移,公款消费等,负努力行为对企业的作用和正努力行为正好相反。

(二)企业收益与经营者的正努力水平成正比。令 Y 表示企业收益,则 $Y(h_1) = Ah_1^a$, 其中 h_1 表示正努力, $h_1 \geq 0$, $A > 0$, $0 < a < 1$ 。 Y 满足一阶递增,二阶递减条件,即经营者付出的正努力增加会使企业收益增加,但收益增加的趋势是递减的,这是因为个人能力的限制使收益不可能趋于无穷大。企业收益虽然有随努力增加而递增的阶段,但在现实的均衡状态下,这一阶段并不存在,边际分析可以舍弃这一阶段。

努力水平在企业收益函数中可以定义为其变量的系数,但在这里作为一个变量对待。努力水平的计量单位并不影响我们的结论,所以在这里不必作详细规定。

在外部环境一定,即监督水平、信息透明度、法制状况给定的状态下,经营者付出正努力行为是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中的激励机制相联系的,正努力增加企业收益,经营者也可以获得效益奖金、持股收入、购股权收入等,但是经营者收入的增加幅度要小于企业收益的增加幅度。这样经营者的正努力收入可表示为 $R(h_1) = C(Ah_1^a)^c$, 其中 $C > 0, 0 < c < 1$ (事实上,在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下,正努力的收入弹性 (ac) 是如此之低,以致于对 h_1 的激励微乎其微)。经营者付出正努力所获得的收益不只包括货币收益,还包括地位、声誉、荣誉等精神收益,但是本文认为货币收益是激励经营者行为的决定因素,精神收益是次要因素,国有企业的状况可以反证这一观点,对经营者进行教育和精神奖励,对提高企业效率不起决定作用。

(三)企业损失与经营者的负努力水平成正比,但负努力的增加使损失的规模趋于减小,这是因为权力范围和社会限制使损失不可能趋于无穷大。令损失为 L , 则 $L(h_2) = Bh_2^b$, 其中 h_2 表示负努力, $h_2 \geq 0, B > 0, 0 < b < 1$ 。

企业损失是由于经营者采取短期行为或自利行为所造成的企业收益减少。一般说来,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如进行掠夺性资产转移、公款消费等)是同经营者的自身效用密切相关的,因此负努力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在本文中假定为经营者效用的一部分。

(四)前文说明,经营者付出努力行为以实现效用最大化。经营者的效用由三个部分组成:基本工资和基本福利——这是不随努力行为变化的部分,令其为 W_0 、正努力行为所获得的收益和负努力行为所获得的收益,这三部分都可以用货币单位统一表示,根据前文的假设,经营者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U(h_1, h_2) = W_0 + C(Ah_1^a)^c + Bh_2^b \quad \textcircled{1}$$

$U(h_1, h_2)$ 是在外部环境给定的条件下,由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所决定的经营者效用函数,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是指由企业组织结构和权力分配状况所决定的企业制度安排。经营者效用最大化决定了 h_1 和 h_2 的选择,从而决定了企业收益和代理成本,使 h_1 最大和 h_2 最小的组合就是代理成本最小化的选择。但是只根据这一函数并不能决定经营者的行为均衡,由此引入下一个条件。

(五)经营者付出两种努力行为以实现效用最大化,但是正努力和负努力的绝对量值不是无限的,它们受经营者的能力水平以及外部环境的制约,后两者决定了正努力和负努力的组合。外部环境包括竞争性的商品市场、要素市场、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以及法制设施、社会服务机构等等,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外部环境还包括了政府实现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的机构和制度设施。令经营者的能力水平为 h , 则

$$h = h_1 = Ph_2 \quad \textcircled{2}$$

其中, $P = -dh_1/dh_2$ ($p > 0$), P 为正努力转化为负努力的难度系数,也是正努力和负努力之间的替代成本,它取决于外部环境所决定的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和制约机制,外部环境的改善使经营者付出负努力行为的风险和机会成本趋于增加,从而 P 趋于增大。由②式可作个人能力曲线,如图 1 所示。

外部环境对于经营者行为的直接作用在国有企业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典型的资本主义私人企业中,企业治理结构是以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集中式对称分布为特征的,这种企业的模式是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集中地掌握在资本所有者手中,企业的效率来源于股东大会、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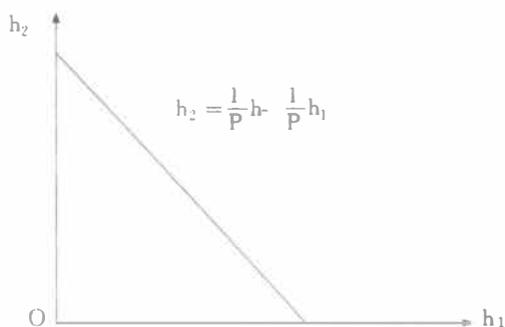


图1

会、监事会、经理人之间的权力制衡和控制权的分配。在产权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将很大部分的经营权下放给企业，但政府也保留了一项重要的权力，即对企业高层经理人员的任免权，这是企业控制权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政府机构还掌握企业人事控制权的条件下，政府通过对董事成员、经理人员的任免和影响直接分享了企业的控制权。外部信息和市场设施不仅通过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对代理成本产生作用，而且，由于政府机构作为国有资产的代理人的特殊地位，资本市场、社会中介服务机构提供的信息往往直接对政府机构产生作用，然后由政府机构据此选择经营者或直接干预企业经营，这些信息对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作用反而受到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发育状况的限制而不能得以充分利用。这种作用不仅是企业外部，即政府施加的，而且也无需通过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认可，它是政府直接施加于企业的。政府行为的经济化、市场化以及经理人市场的发育状况决定了对经营者的选择和对经营者努力水平的激励和约束，这样外部环境状况构成了企业外部的激励、监督和制约机制，这些机制直接决定了代理成本的多少。外部环境的改善意味着经济信息透明度增加、监督水平提高、法制趋于完善，政府机构（或社会服务机构）对于企业行为的监督和约束成本降低，经营者采取短期行为的风险和机会成本增加，这样经营者就必须减少短期行为和增加长期行为以维持效用最大化。

三、经营者行为与外部环境关系分析

根据①式，令 $U(h_1, h_2) = K$ 不变，则可以推导出经营者效用函数的性状：

$$dh_2/dh_1 < 0 \quad (3)$$

$$d^2h_2/dh_1^2 > 0 \quad (4)$$

根据推导的结论可以作出经营者效用的无差异曲线图，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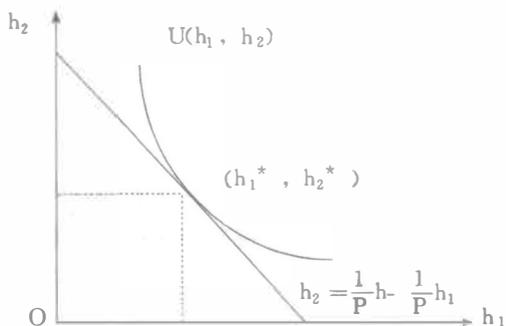


图2

经营者效用的无差异曲线表明,为获得相同的效用,两种努力 h_1 和 h_2 存在着互相替代的作用,而且两种努力的边际替代率是递减的。

将经营者效用的无差异曲线与个人能力曲线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到给定的能力水平、外部环境及内部治理结构条件下的经营者效用最大化的努力组合及效用水平。

经营者效用的无差异曲线与个人能力曲线的切点 (h_1^*, h_2^*) 就是经营者行为选择的均衡点。在这一点上,两种努力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个人能力曲线的斜率,即

$$dh_2/dh_1 = -1/P$$

根据③式可得

$$PCA^c a c h_1^{c-1} - B b h_2^{b-1} = 0 \quad (5)$$

这就是经营者行为均衡必须满足的等式。

当 P 增大时,即经营者所处的外部环境得以改善(包括各种要素市场的完善、竞争机制的完善、法制的健全等),在经营者的能力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个人能力曲线会发生内移,由此造成正努力和负努力的相应变动,这种变动是通过两种效应达到的,一是替代效应,二是能力效应。

(1) 替代效应

如图 3 所示,原始能力曲线为 GM , P 增大后, h 不变的情况下,能力曲线移至 GN , 原始均衡点为 $H(h_1^*, h_2^*)$ 。

这 H 点作 GN 的平行线 HF , HF 表示初始努力水平仍能满足的能力曲线。新的均衡点为 $H'(h_1', h_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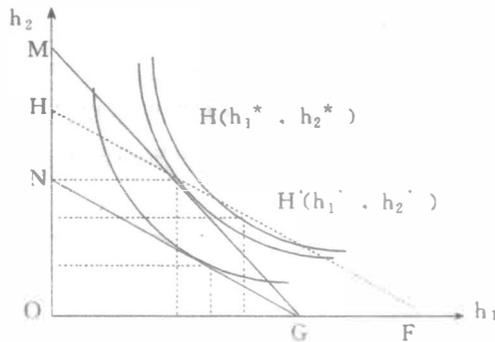


图3

P 上升,初始努力水平依然能够满足的条件下, h_1 和 h_2 的变动情况可以通过对⑤式求偏导得出:

$$dh_1/dp > 0 \quad (6)$$

$$dh_2/dp < 0 \quad (7)$$

替代效应表明由于 h_1 转化为 $1h_2$ 的难度系数增大,经营者趋向于付出更多的正努力和更少的负努力。即使根据希克斯替代效应,经营者为维持原来的效用水平也必须付出更多的正努力和更少的负努力。

(2) 能力效应

能力效应表明由于能力水平的变动引起正努力和负努力同时升降,导致效用水平发生变化。在图 3 中, HF 下移至 GN , 表明由于能力水平下降使正努力和负努力同时减少。

综合以上两种效应,在经营者的能力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外部环境改善引起的努力组合的变动情况可以表示如下:

$$dh_1/dp > 0 \quad \textcircled{8}$$

$$dh_2/dp < 0 \quad \textcircled{9}$$

⑧式说明外部环境的改善使经营者付出的努力增加,⑨式说明外部环境的改善使经营者付出的负努力下降。以上考察了外部环境对经营者均衡行为的影响,从证明的结论中可以看出,改善外部环境使经营者实施短期行为和自利行为的风险和机会成本加大,从而促进经营者改善自己的努力组合,增加长期行为和减少短期行为,这样改善外部环境也起到了减少代理成本、提高企业效率的作用。企业治理结构的设计就是要减少经营者的负努力行为,增加经营者的正努力行为。据前文说明,外部环境通过政府机构对经营者的选择和对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直接对经营者的努力组合产生作用,从而对减少企业的代理成本起到直接的作用。在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下,外部环境实际上构成了企业治理结构的一部分,即企业的外部治理结构。

另一方面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对经营者行为及代理成本的影响见诸于许多经典文献,即使根据本文的模型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在此不作详细讨论。

四、结 语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经营者行为模型证明了经营者的行为均衡条件和代理成本同时取决于外部环境和内部治理结构两方面。

2. 在政府机构还掌握一定的企业控制权的情况下,外部的激励、监督和制约机制对减少代理成本能起到直接的作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提出了明晰产权的努力方向,目的是解决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利益不一致、信息不对称和责任不对等的问题,达到激励相容的结果。改善产权状况要求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但这将影响企业治理结构的外部因素剥离出来,这些因素同样是决定代理成本和企业效率的独立部分。在渐近式改革的背景下,完善市场机制、加强法制管理、增强社会监督力量等等一系列的努力,通过激励、监督和制约机制的作用,对经营者的代理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力量。

3. 委托——代理关系不仅仅是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所能解决的问题,利益相关、信息透明、责权对等的代理机制是建立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基础上的,俄罗斯和中东欧一些国家的休克疗法所带来的问题足以为鉴。这种改善市场环境的努力也许要付出巨大的艰辛,但对于国有企业改革来说,这是必经的路径。

参考文献:

1. 樊纲等:《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2. H. 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3. 钱颖一:《企业的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结构改革》,《经济研究》1995年第1期。
4. 林毅夫等:《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经济研究》1997年第3期。
5. 曹正汉:《寻求对企业性质的完整解释:市场分工的不完备性与企业的功能》,《经济研究》1997年第7期。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系;邮编:200083)